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经济

纪念版

亚洲的戏剧

〔瑞典〕冈纳·缪尔达尔 著

〔美〕塞思·金 缩写



SINCE 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纪念版

亚洲的戏剧

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

[瑞典] 因纳·缪尔达尔 著

[美] 塞思·金 缩写

方福前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瑞典)冈纳·缪尔达尔著;(美)塞思·金缩写;方福前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经济学)

ISBN 978-7-100-13856-7

I. ①亚… II. ①冈… ②塞… ③方… III. ①贫困问题—研究—南亚 IV. ①F13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6470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亚洲的戏剧
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
〔瑞典〕冈纳·缪尔达尔 著
〔美〕塞思·金 缩写
方福前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3856-7

2017年8月第1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4 $\frac{1}{4}$

定价:55.00元

Gunnar Myrdal

ASIAN DRAMA

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

An abridgement by Seth S. King

© The City of Stockholm by Its Division of Culture

本书根据 Vintage Books 1972 年版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出版说明

201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迎来120岁的生日。120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之志,无改初心。

译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20世纪初年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1980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1981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序 言

读者如果不看本书的副标题和内容,可能认为这是一本有关戏剧方面的著作。实际上,这是一本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撰写的专门研究亚洲国家贫困与发展问题的学术名著。

本书作者及其主要著作

本书作者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 1898~1987年)是瑞典著名经济学家,瑞典学派(又称北欧学派或斯德哥尔摩学派)的领袖人物之一,也是新制度经济学(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代表人物,发展经济学的主要先驱。他因在货币理论和经济波动理论方面的贡献以及对经济、社会和制度等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深入研究而获得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缪尔达尔于1898年12月6日出生于瑞典中部的达拉纳(Dalarna)省的古斯塔夫(Gustaf)教区,祖籍芬兰。其父亲是铁路建筑公司职员,母亲是家庭主妇。

缪尔达尔的童年和少年是在家乡农村度过的。1918年,他进入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法律,1923年毕业后以律师为职业。在任律师期间,他同时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研读经济学,师从瑞典学派的



奠基人之一的古斯塔夫·卡塞尔(Gustav Cassel, 1866~1945年), 1927年获法学和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 他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 1931~1932年在日内瓦国际研究院任副教授, 1933~1939年任斯德哥尔摩大学卡塞尔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

缪尔达尔最初在经济学方面的兴趣是微观经济学, 尤其是厂商行为和厂商计划。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价格形成以及对利润和资本价值变化的影响, 他把不确定性和预期纳入厂商的决策分析。1929年10月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使缪尔达尔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重点由微观经济学转向宏观经济学, 尤其是经济波动问题和制度经济学。这种研究重点的转移是在美国完成的。大危机爆发的这一年, 他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赴美国作访问研究。

1934年, 缪尔达尔回到瑞典。此后, 他一方面倾心于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研究, 另一方面积极活跃于政坛。他在经济学研究方面硕果累累, 著作等身; 在政界也春风得意, 数度身居要职。他是瑞典社会民主党领袖, 1934年当选为瑞典议会参议员(任期为1935~1939年)。

1938年, 受卡内基公司邀请和资助, 缪尔达尔再度来到美国, 专门就美国黑人问题进行了长达4年的大规模调查研究。这项研究的最终成果于1942年完成, 1944年由纽约的哈珀出版公司出版, 这就是《美国的两难处境: 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缪尔达尔出任瑞典银行董事长。1942年, 他第二次当选为瑞典议会参议员(任期为1943~1947



年)。1943~1945年,他出任瑞典政府战后计划委员会主席。1945~1947年,他接替瑞典学派的另一位主要代表人物——俄林(Bertil Ohlin)出任瑞典政府商务部长。

1947年年初,缪尔达尔离开瑞典,出任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秘书长。他担任此职长达10年。

1953年,由于要与联合国新成立的亚洲经济委员会秘书处和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秘书处进行合作,缪尔达尔有机会访问了南亚诸国,由此引发他对亚洲和其他欠发达国家发展问题的兴趣。为了专心于南亚国家贫困和发展问题研究,缪尔达尔于1957年辞去了在联合国担任的职务,全身心地投入对南亚、中国西部和前苏联西南部(今天的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的发展问题研究,其重点是研究印度等亚洲诸国。在二十世纪基金会(纽约)的资助下,这项研究工作持续了整整10年。这项研究的最终成果就是《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

1961年,缪尔达尔返回瑞典,受母校斯德哥尔摩大学之聘担任国际经济学教授;同时,为斯德哥尔摩大学筹建国际经济研究所,并出任所长。

缪尔达尔一生获得30多个荣誉学位,并于1945年当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1974年,他和奥地利学者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分享了该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1924年10月8日,缪尔达尔与阿尔娃·蕾默(Alva Reimer)结为夫妇。蕾默也是一位政治活动家。1970年,缪尔达尔夫妇荣获西德和平奖章。1982年,蕾默获诺贝尔和平奖。夫妇同获诺贝



尔奖,这在诺贝尔奖颁奖历史上是罕见的。

除了上面提到的两本著作外,缪尔达尔的主要著作还有:《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1930年瑞典文版,1953年英文版);《瑞典的生活费用:1830~1930年》(1933年英文版);《货币均衡论》(1933年瑞典文版,1939年英文版);《财政政策的经济效果》(1934年瑞典文版);《人口:民主问题》(1940年英文版);《关于政府间组织的现实与假象》(1955年英文版);《发展与欠发展:论国内与国际不平等的机制》(1956年英文版);《国际经济学:问题与前景》(1956年英文版);《经济理论与欠发达地区》(1957年英文版);《社会理论中的价值:方法论论文集》(1958年英文版);《超越福利国家》(1960年英文版);《挑战丰裕》(1963年英文版);《社会研究中的客观性》(1969年英文版);《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计划纲要》(1970年英文版);《欠发达国家中的软弱国家》(1970年英文版)和《反潮流:经济学批评文集》(1972年英文版)。

本书主要内容

《亚洲的戏剧》一书完成于1966年年初,1968年由设在美国纽约的二十世纪基金会出版。

当时这本书共3卷,长达2300页,是一部名副其实的长篇巨著。为了将缪尔达尔的这个研究成果以一种简短、可读的形式提供给读者,尤其是提供给本书所论及的亚洲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二十世纪基金会董事局决定在3卷本的基础上再出版一部1



卷本的缩写本。经过塞思·金(Seth S. King)的缩写和缪尔达尔的审定,1卷本的《亚洲的戏剧》于1971年用英文出版。本书就是根据这个缩写本翻译的。

本书主要研究南亚国家贫困的原因和如何脱贫、如何发展的问题。缪尔达尔在本书所说的“南亚”或“南亚地区”主要包括印度、巴基斯坦、锡兰(1978年改称斯里兰卡)、缅甸、马来亚(1963年和新加坡、沙捞越、沙巴合并组成马来西亚,1965年新加坡宣布退出)、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还包括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因此,本书所说的“南亚”比我们地理书上所说的南亚包含的国家要多得多。根据地理学上的划分,南亚诸国一般只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这5个国家。本书涉及的11个亚洲国家分布在南亚和东南亚,所以,本书比较恰当的副标题应当是“南亚和东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

本书共5篇27章,其内容涉及发展经济学的方方面面:资源、人口与经济发展;经济结构与国民收入;农业、手工业和小型工业与经济发展;工业化问题;不平等问题;教育、卫生保健与人力资本投资;发展计划;对外贸易与利用外资。

与笔者研读过的发展经济学论著相比,本书所讨论的以下两个问题是一般的发展经济学著作所没有的或语焉不详的。我认为,这两个问题是极为重要的。

1. 发展经济学兴起的原因和目的何在

对欠发达国家进行研究原来是西方文化人类学家的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经济学家才开始热衷于研究欠发达国



家的不平等、贫困和发展问题,并由此促成了发展经济学的兴起。发展经济学之所以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缪尔达尔把它归结为3个方面的原因:殖民制度瓦解以后欠发达国家本身渴望发展;那些出于自身利益进行思考和行动的人们渴望发展;在冷战中达到白热化程度的国际对抗关系使得欠发达国家的命运成为发达国家对外政策所关注的问题。本书作者认为,第三个原因是引起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学者及其学术机构对欠发达国家问题感兴趣的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在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一方、前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为另一方的国际对抗关系中,争取到欠发达国家或至少让这些国家保持中立,对西方国家具有越来越突出的政治重要性。这就使得对欠发达国家的研究含有明确的政治目的。现在对欠发达国家的问题所进行的研究,经常是出于一个国家或一个集团的一时的和狭隘的政治利益或战略利益,而不是为了普遍和永恒的价值。本书作者批评说:“在对穷国进行经济研究方面存在偏向的主要根源是多数研究力图按照西方的政治和军事利益的观点——把穷国从共产党政权中拯救出来,来看待穷国的内部问题”(本书第10页)。

2. 用什么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欠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

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发展经济学主要是用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观察和研究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这种研究传统实际上是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一般命题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本书作者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研究传统。他批评说:“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更倾向于得出—

般性的命题,然后假定这些命题对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和任何文明都有效”(本书第 13 页)。他认为:“只要这些理论(西方经济理论——译者)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这种假定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可能就没有什么危害。但是,用这些理论来研究南亚欠发达国家——这些理论并不适用于这些国家,后果就严重了”(本书第 13 页)。他的基本观点是:市场与价格、就业与失业、消费与储蓄、投资与产出这些“经济学”术语是从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态度、制度和文化中抽象出来的,它们用于分析西方世界可能有意义,并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用于分析欠发达国家显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在欠发达国家,不能进行这种抽象;实际的分析必须讨论态度和制度关系方面的问题,必须考虑非常低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发展后果(本书第 14 页)。我们认为,本书作者的研究态度是实事求是的;作为一位西方学者,能够持有这样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作者的这种观点对我们中国经济学者也是有教益的。

缪尔达尔在本书中认为,南亚国家基本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与发达的西方国家有着根本上的不同,“我们把这个不争的事实作为我们分析的起点”,而“理解南亚国家发展问题关键性的第一步是要竭力发现它们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左右它们绩效的是什么样的机制”,“我们要用另一套新的、更适合于这些国家现实的理论概念来代替常规的理论概念。我们不但需要确定能够解释这些经济的特性的机制,而且要建立一种适用于研究发展动态问题和制定发展计划的分析结构”(本书第 17 页和第 18 页)。

正是由于本书不是简单地照搬照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而是使用一套新的理论和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亚洲国家的贫



困和发展问题,才使得本书在发展经济学中独树一帜,成为发展经济学中的一部名著。

为什么把这本研究南亚和东南亚国家贫困和发展问题的著作取名为《亚洲的戏剧》?作者在本书第一章的最后对此做了说明:“选择《亚洲的戏剧》作为本书的书名,是为了表达作者在开始这项研究时所怀有的、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增强的关于南亚问题的信念。在所有复杂的和不同的事物背后,我们意识到有一系列相当鲜明的冲突和一个共同的主题,就像在戏剧里看到的一样。这场戏剧中的活动正在迅速走向高潮,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紧张正在加剧”(本书第21页)。作者把摆脱殖民统治、走向民族独立的亚洲国家的发展比做一部戏剧,戏剧的主角是亚洲国家人民自己,而其他地方的人都是这部戏剧的参与者(不是观众),西方学者和西方援助者只充当配角;决定这部戏剧最终结局的是亚洲国家人民,而不是其他人。亚洲发展的这部戏剧虽然有其复杂性和差异性,但是表达的却是一个简单的主题,这就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早就探讨过的主题——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本书特色

《亚洲的戏剧》试图在经济、政治、制度、文化、习俗等广泛的层面上研究欠发达国家贫困的原因。它是一部发展经济学的早期代表作,同时它又不是一部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范畴基础上的发展



经济学著作。本书有下列特色：

1. 专门以亚洲国家的贫困和发展作为研究对象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的著作真可谓汗牛充栋，但是专门研究亚洲国家的贫困和发展问题的著作却是凤毛麟角。本书的研究范围涉及11个亚洲国家。在这11个国家之外，本书还谈到中国、新加坡、朝鲜、韩国。本书着墨最多的是印度。所以，本书既研究了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印度），也研究了发展中国家中的小国，这些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书所论及的11个亚洲国家在地理位置上彼此相邻，在气候上同属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更为重要的是，这11个国家有着共同的经历——除了泰国，这些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都曾经是西欧发达国家的殖民地；有类似的文化背景——盛行佛教，土语和西语并行，华人文化（如儒家思想）覆盖着这11个国家中的多数国家，价值观和习俗也大体相同；有相同的经济状况——贫穷，社会和经济极端不平等，大多数经济活动长期停滞不前。这些相同和相似之处给这些国家的生活、活动和发展打下了明显的烙印。

本书所研究的这11个亚洲国家都是中国的邻居或近邻，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状上看，这些国家都与中国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与重点研究非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论著相比，本书的研究成果更贴近中国，本书的分析对我们更有启发、更有意义。

2. 强调制度分析

本书作者通过对亚洲11个国家长达10年的研究发现，阻碍



这些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障碍是巨大的,对这些障碍的严重性绝不可低估。这些障碍的源头在哪里?“这些障碍基本上是由现有制度和观念中存在的低效率、教条僵化和不平等造成的,是由这种制度和观念中包含的经济和社会权力关系造成的”(本书第 27 页)。由于这个原因,西方主流经济学惯用的数量分析方法和结构分析方法在亚洲国家贫困和发展问题研究上就少有用武之地。那么,本书使用的是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呢?本书使用的是作者早在《美国的两难处境》和《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地区》中使用过的制度分析方法(*institutional approach*)。作者在本书第一章就声明:“我们的研究方法总的来说是‘制度’方法,我们希望按照这种思路大大地加强研究工作。为了使研究真正有成效,这种新的方法必须更能说明在常规的经济分析中经常不加以考虑的那些事物”(本书第 18 页)。

作者认为,南亚村社的制度结构从古代封建制度到今天盘根错节的集团的演变,对南亚社会经济状况产生了深刻影响。

南亚国家的状况不适用于西方经济学的惯用模型。因为这些模型暗含的前提是,大部分经济活动都是面向市场的交易,因此生产和交换可以根据理性的经济核算来进行讨论。但是,在南亚国家,农产品市场并不发达,这就使得在西方常用的维持农产品价格以刺激生产或改进市场的方法,在南亚几乎毫无效果。

土地使用权的无保障性剥夺了南亚佃农提高产出的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地租的变化没有与净收益挂钩,而是以总产量为转移,这一事实意味着这种制度对精耕细作有一股强大的内在阻力。地主也没有强有力的投资动机,因为他在无需投资的情况下也能



获得可观的收益。

因此,作者认为:“南亚国家存在着若干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条件:土地占有制不利于农业进步;推动创办企业、就业、贸易和信用的机构聊胜于无;有些国家还没将各种不同的人群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国度;有些国家的政府机构缺乏必要的权威;有些国家公共管理的效率和廉政标准十分低下。所有这一切共同组成了‘软弱的国家’。这些制度性衰弱的根源是人民参与程度低以及刚性的、不平等的社会分层”(本书第 375 页和第 376 页)。

作者进一步认为,诸如此类的制度的缺陷与公众态度的缺陷紧密相联。这些态度通常支撑着制度,同时得到制度的支撑。“两者对低下的生产率和菲薄的收入均难辞其咎。低生产率和低收入反过来使低水平的识字率和教育水平长相伴随,而又使公共制度的缺陷挥之不去”(本书第 376 页)。

因此,作者的结论是,南亚国家要获得发展,要提高穷苦群众可悲的社会水平,需要进行激进的制度改革。

我们要强调的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制度分析在国内外学术界成为时髦的论题,而我国学术界很少有人注意到,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缪尔达尔就强调并使用制度方法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在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进入关键阶段的今天,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迈进的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缪尔达尔的《亚洲的戏剧》一书,会从中获得许多启示。

3. 用系统论方法研究经济发展

本书作者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不是

